

“腾格里”牛枝子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

本报讯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703号》公布了2023年全国草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草品种目录。由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张吉宇教授主持选育的“腾格里”牛枝子新品种名列其中,品种登记号:652。这是学院继2016年选育的首个超旱生乡土草新品种“腾格里”无芒隐子草后,选育的又一“腾格里”系列超旱生乡土草新品种。目前,该团队围绕“腾格里”牛枝子新品种建立了50余亩原种扩繁田,配套建立了高产种子生产技术体系,与“腾格里”无芒隐子草组合的“豆禾”混播技术体系。该品种及相关技术体系已经在荒漠生态修复、矿山修复项目中推广利用,获得相关成果转化2项。(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兰州大学2本期刊新增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集刊)目录

本报讯 近日,我校2本期刊收到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证书。《敦煌学辑刊》新增入选为CSSCI(2023-2024)来源期刊,《国学论衡》新增入选为CSSCI(2023-2024)收录集刊。《敦煌学辑刊》是由兰州大学主办、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办的以刊载敦煌学学术论文为主的专业刊物,也是中国内地首家敦煌学专业刊物。《国学论衡》是由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兰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主办的刊登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及书评札记、学界动态等的专业刊物。(社会科学处)

躬耕教坛 强国有我

兰州大学召开第39个教师节庆祝表彰大会

本报讯 9月8日下午,在第3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兰州大学在城关校区国图报告厅召开庆祝表彰大会。校党委书记马小洁,中国科学院院士、校长严纯华,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国生,副校长潘保田,党委副书记曹爱辉,副校长曹红、陈熙明、勾晓华,党委常委王雪峰、安俊堂,校长助理李鹏杰,荣休教师代表、从事教育工作满30年教师代表、新入职职工培训全体教师学员、中青年教师代表等参加大会。大会由严纯华主持。

马小洁代表学校党委向全校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他指出,今年以来学校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相结合,更加明确了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服务支撑强国战略的路径方向,更加坚定了“在西北办好一流大学”的信心和决心,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有组织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和重要成果。学校取得的成绩离不开老师们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的精神,改革创新的担当和争创一流的意识。希望受到表彰的老教师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发挥传帮带作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广大教师要受表彰的先进教师为榜样,刻苦钻研业务,增强育人本领,踊跃投身教育创新实践,争当“四有”好老师,立志成为“大先生”。

马小洁表示,全校教师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进一步增强建设教育强国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自觉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新任务,自觉落实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奋力开拓“在西北办好一流大学”新局面,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贡献更多的兰大力量。一是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中赓续兰大精神,以团结一心的意志投身于教育强国事业。要讲政明大德,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定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增强“主人翁”意识,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将“小我”融入“大我”,凝聚学校发展的磅礴伟力。二是要在陶冶道德情操中秉承立德垂范,以艰苦奋斗的品质奉献于教育强国事业。要做德才兼备的“能者”,从不断涌现的“萃英大先生”“萃英好老师”身上汲取精神力量,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人,将个人理想、事业发展融入时代之间、国家之需、社会之困、人民之盼,立志成为心怀家国的“大者”。三是要在涵养扎实学识中革故鼎新,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奋斗于教育强国事业。要因时而新、守正创新、开拓创新,深化“科研是源、教学是流”的教育观念,开拓“教学传授知识,科研创造知识”的教育视野,以高水平科研反哺高质量人才培养,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融入教学科研工作,交出“教育强国、兰大何为”的高分答卷。四是要在勤修仁爱心中爱岗敬业,以争创一流的追求致力于教育强国事业。要“严爱相济、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寓教于乐”,像珍爱生命一样珍视教师职业,努力成为学生学业上的引路人、成长中的好朋友。学校各级党组织要深化认识,始终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突出思想引领,营造尊师风尚,培养造就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

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严纯华祝福全校教职工节日快乐,表示学校今年教师节表彰以“躬耕教坛、强国有我”为主题,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教师之力、教育之力、凝心铸魂、铸魂育人,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希望老师们兼具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自觉站在政治的高度、世界的角度积极思考和实践“强国建设、兰大何为、教师何为”,以教育者的使命和担当,自觉为服务支撑人类科技发展和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希望老师们兼具开拓创新的精神和担当作为的能力,把握科技发展的大趋势,保持对学科发展的敏锐嗅觉,始终对标前沿方向,在促进学科协同融合发展中找准位置,“咬定青山不放松”“板凳坐得十年冷”,努力在持之以恒中成就个人梦想,绽放个人精彩;希望老师们兼具教书育人和科研育人协同发展的能力,始终把教书育人放在心尖尖的位置,把给学生“全营养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作为自己教书育人的出发点,主动自觉地做一个科研强、教学强、科教融合更强的好教师。

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师德师风宣传视频《师道如兰》,共同感受教师教书育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会上,党委教师工作部副部长吴振荣讲述了“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获得者任继周先生立德树德、教书育人的师德故事,向任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大会对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示范团队、国家级和省部级特等奖获奖教师代表、学科建设优秀单位及先进个人代表、从教30年教师代表、荣休教师代表进行了表彰。

获奖教师代表、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吴锁教授结合带领放射化学与核环境团队入选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示范团队的经历,以“站高一点”“住深一点”“朝实处落”“向一流奔”为脉络,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从教30年教师代表、外国语学院徐艳副教授分享了从教30年来的经历和感想,表达了对教师职业的热爱,希望继续保持一颗做好份内工作的平常心,对教育事业发自内心的热爱,肩负时代使命,铭记初心,继续前行。荣休教师代表、基础医学院汤晓琴副教授回顾了退休后作为银龄教师参加对口支教的工作经历,表示自己虽身在兰大之外,但将继续秉承兰大精神,发挥老同志余热,为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贡献一份兰大力量。

会上举行了新教师入职仪式,向结业学员颁发结业证书,向优秀学员颁发获奖证书,全体教师向新教师代表赠送了“萃英大先生”“萃英好老师”纪念徽章。新教师岗前培训优秀学员代表、哲学社会科学学院钟耀林副教授分享了初入兰大时的温馨经历与感受,讲述了对兰大精神的理解,希望通过点滴努力,脚踏实地,努力做到与优秀的前辈们同频共振,为学校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学院(研究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表彰大会。党委宣传部(融媒体中心)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与学校领导看望任继周先生



本报讯 在第39个教师节当日,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小洁、校长严纯华专程前往北京,与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一行看望慰问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任继周先生。

任友群向任继周先生荣获“2023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荣誉称号表示衷心的祝贺,并颁发了荣誉证书。任友群表示,任继周先生作为我国草业科学的学科奠基人和发展推动者,七十余载一心扎根学科科研第一线,始终致力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事业,是广大教师的优秀代表和杰出楷模。

马小洁和严纯华分别为任继周先生颁发了学校的奖学金,送上了学校特邀书法家李恒滨创作的“学为宗师,人为楷模”的画卷。

慰问期间,学校党委教师工作部负责人向任继周先生汇报了在学校教师节庆祝大会上关于先生“教”“书”“育”“人”四个方面师德故事讲述的情况,并向任继周先生致以崇高敬意。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学校办公室、党委教师工作部、人力资源部和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等相关单位负责人陪同看望慰问。(党委教师工作部)

学校领导看望慰问部分教师 向广大教职员致以节日祝福

本报讯 在第3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学校领导马小洁、严纯华、吴国生、潘保田、曹爱辉、曹红、沙勇忠、陈熙明、勾晓华分别看望了许真诚、杨建新、郑炳林、周又和、吴王锁、罗彦锋、沈禹颀、王锁民、王育华、田文寿、王为、唐瑜、王记增、聂军胜、邓建明、方泉、李克欣、管晓丹、魏少文等教师代表,感谢大家为学校建设和发展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代表学校向辛勤工作在各个岗位上的全体教职员致以节日祝福和亲切问候。

看望过程中,校领导详细了解了老师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围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学校发展等内容深入交流,并悉心嘱咐老师们照顾好身体。校领导表示,各位老师辛勤耕耘、爱岗敬业、静心教学、潜心科研,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产出了

大量高水平成果,为学校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教师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以“四有”好老师的标准要求自己,坚持教书育人和言传身教相统一,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瞄准科学前沿,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将个人前途、学校发展与国家命运融合在一起,为学校“在西北办好一流大学”新局面贡献力量。相关单位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努力营造有利于各类人才潜心育人和科研报国的良好氛围。

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有关学院负责人参加看望慰问活动。

学校办公室 党委宣传部(融媒体中心) 党委教师工作部

我校举行2023级城关校区新生开学典礼

本报讯 又是一年开学季,和风细雨迎新生。9月8日上午,兰州大学2023级城关校区新生开学典礼在西区田径场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马小洁,中国科学院院士、校长严纯华,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国生,副校长潘保田,党委副书记曹爱辉,副校长曹红、陈熙明、勾晓华,党委常委王雪峰、安俊堂,校长助理贺德怀、李鹏杰出席典礼。典礼由潘保田主持。

上午8:30,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护送五星红入场。田径场响起庄重肃穆的国歌,在全体师生的注目下,国旗冉冉升起。

校领导为2023级研究生代表佩戴校徽,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学院党政负责人、参会教职工就近为新生佩戴校徽,其余同学也将校徽佩戴在胸前。蓝白配色的校徽是属于兰大人的光荣象征,承载着兰大人坚守奋斗百余载、家国情怀系天下的使命和担当,“自强不息、独树一帜”的校训在此刻亦铭记于心间。

严纯华发表了题为《做心怀热爱探索创新的兰大人》的致辞,代表学校向1136名博士研究生、3898名硕士研究生、177名国际学生进入兰州大学学习和生活表示热烈欢迎。

严纯华表示,同学们要勇于担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和重要责任,站在强国建设新征程的起点,把握奋进新征程的航向,站在“前辈肩膀”上书写新的辉煌。

严纯华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本科专业学习和成长积淀,同学们正式进入更加“专精深”的研究生学习阶段。选择攻读研究生,缘于兴趣、成于勤奋、荒于蹉跎、废于自弃。正因为如此,希望同学们从今天开始,用热爱和自律筑牢根基。科研是一个苦中作乐的过程,所有的

研究都是在失败中前行,成功“秘籍”是“此技无他,唯手熟耳”。同学们要充分了解和尽快融入课题组,找准研究方向和本领域的学术前沿,找到并拥有“热爱”的研究课题,为之激情奋斗、以苦为乐。同学们要用规划和效率追求卓越。科学的科研规划是提高研究生学业效率的重要途径,同学们要从现在开始,围绕研究课题从时序、工序上同时做好规划,遇到问题及时交流探讨,坐住板凳、久久为功,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地扎实推进,努力让自己科研的脚步更加坚定扎实,如期圆满地完成学习和科研任务。同学们要用探索和创新寻求突破。科研最迷人之处,在于其存在很多未知和不确定性,希望同学们既遵循基本的学术规律,也要敢于跳出程式化思维,勇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断地优化研究思路,改进研究方法,努力取得新突破。同学们要用梦想和情怀引领时代。希望同学们自觉承担起时代使命,立足各自专业领域,把科学研究课题建立在国家战略急需领域,把国家和社会的需求作为自己奋斗的理想和目标,从理想出发,在现实中落脚,真正把科研论文写到服务国家决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努力用年轻人的智慧解决时代的课题,成长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导师代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化学化工学院特聘教授以学长和师长的身份,与新生们分享了关于“走好研途之路”的体会。他表示,作为研究生应勤于思考、敢于实践,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钻研精神;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恒久韧劲;要纯善磊落、陶(下转4版)

“各民族共创中华”论坛暨杨建新先生九十寿诞座谈会在我校举行

本报讯 9月8日—10日,“各民族共创中华”论坛暨杨建新先生九十寿诞座谈会在兰州大学举行。会议由兰州大学主办,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省政协理论研究会联合承办,兰州大学社科处、烟台大学民研所、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兰州大学青藏高原环境研究中心、甘肃省丝绸之路研究会、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民族学院等协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130余人齐聚一堂,就杨建新先生的“各民族共创中华”学术思想与学术生涯、学术贡献等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分享。

本次会议以“各民族共创中华”为主题,透过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理论和视角,认识和理解“各民族共创中华”的深刻内涵与实践路径,并用跨学科的话语和理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特色民族学话语体系”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思考,系统回顾与总结了杨建新先生的学术生涯、学术造诣和学术贡献等。

9月9日上午论坛开幕。中国科

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甘肃省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杨维军致辞,兰州大学副校长曹红、沙勇忠参加开幕式。仪式由沙勇忠主持。

严纯华恭祝杨建新先生九十寿诞,并对“各民族共创中华”论坛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在致辞中表示,兰州大学的民族学学科在杨建新先生的引领下发展起来,是兰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的第一个博士点,对于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意义重大。像杨先生一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历史观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观的一大批学者,支撑起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主线。年轻学者要学习并继承杨建新先生的专业知识、观点和思想,更要潜心学习杨先生“厚历史、重现实、开新学”的开拓精神,不断探索钻研,勇攀学术高峰。

杨维军在致辞中说,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紧接国之政、深耕时代和现实问题,走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前列。杨先生

“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林占熿研究员应邀为兰大师生进行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

本报讯 应兰州大学西部生态安全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黄建平院士邀请,“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福建农林大学林占熿研究员来校为兰大师生开展了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林占熿研究员在宣讲中,结合自身从事的“草业”等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

9月5日上午,林占熿研究员前往观云楼,参加大气学院气候学系教工党支部交流活动,与兰州大学气候学系、西部生态安全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青年教师及研究生们进行(下转4版)



烟台市市长郑德雁一行来校开展合作交流

本报讯 9月8日上午,烟台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德雁,市政协副主席、发改委员会主任王松杰及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主任李建平一行来校开展合作交流。中国科学院院士、校长严纯华在城关校区西区科学馆贵宾厅会见郑德雁一行,副校长曹红参加并陪同参观。

作为兰州大学1986级数学系校友,郑德雁回忆了在兰州大学的求学时光,表示“勤奋、求实、进取”的学风使自己受益良多,对兰州大学长期给予烟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高质量发展的智力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介绍了烟台市基本情况,着重介绍了烟台作为工业发达、产业兴旺的东部沿海城市,近代民族工业发祥地之一,目前所拥有的绿色石化、有色及贵金属、生物医药、清洁能源、航空航天、高端装备、食品精深加工、汽车和信息等产业集群。希望未来与兰州大学在推进毅康科技节能环保产研院建设、深化学术科研交流、全面加强人才培养和毕业生就业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

严纯华对郑德雁一行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烟台近年来的发展令人欣喜,郑德雁市长的介绍为兰州大学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城市图景。对于兰州大学来说,我们要充分了解外界的需求信息,掌握世界的动态,结合自身实际,摸清可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学科优势特色家底,统筹规划学科队伍,众志成城,持之以恒,认准一个产业,抓住几个企业,落脚几个产品,扎扎实实推进与烟台的合作,形成具有自身风格特色的校地合作“兰大模式”。希望此次会面能够拉紧双方进一步合作的帷幕,以多种形式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合作、人才培养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实现互利共赢。

会见后,郑德雁一行参观了校史馆。烟台市教育局、科技局、人社局、黄渤海新区工委、市政府办公室、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兰州大学校友会烟台分会,兰州大学学校办、科研院、数学与统计学院、学工部、校友办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见,并就下一步合作事宜进行洽谈。党委宣传部(融媒体中心)

标题新闻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DSLab 团队受邀参加 Google I/O Connect 开发者大会

管理学院三篇案例入选第十四届“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在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中再获一等奖

本报记者 法伊莎 学通社记者 潘怡欣

什么是好大学?
在2023年高考总体录取率预计接近93%的今天,可能答案就像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样多元:
在焦急等待高考录取志愿的学生家长心中,可能所在城市好、名气大、专业热门、就业好的,就是好大学;
在已经进入大学的莘莘学子眼中,在大多偶然选择的专业学习之路上,也许又会逐步了解到城市、学校资源丰富,学风好、实习出国交流机会多、保研率高、就业好的就是好大学;
在教师们眼中,科研平台好、团队好、经费充裕、管理体制机制顺畅、待遇好的就是好大学;
在用人单位的评价体系中,能培养出上手快、认真负责、服从安排、有一定创新意识的人才的就是好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时代,人们了解大学、走进大学的需求更加迫切,何谓好大学之间自然也就无法回避。

那么,在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眼中,什么是好大学?
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首批高等教育专业博士之一,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特聘教授邬大光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已深耕超过40年。2023年3月,他将自己多年来的感悟与思考集结成一本《什么是好大学》。
我们专访邬大光老师,聆听他透过历史的尘埃,穿越东西方文化的阻隔,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东西方文化思想的激烈碰撞中所找到的答案。

「双一流」进行时



邬大光:什么是好大学?

记者:邬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一年一度高考季,上大学,依然是个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热门话题,也和每个家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就想结合您的《什么是好大学》这本书,顺着大学对人、对社会、对国家的影响,以及大学自身的发展来对您做一期访谈。

邬大光:谢谢记者同志。什么是好大学?每个人答案是不一样的。这个话题与每个人的经历有关,也可以说和每个人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教育经历等密切相关。

对我这一代大学人来说,什么是好大学的答案十分清楚,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好大学的认识也更加理性。就我而言,我是插队知青出身,那时候觉得只要能上大学就好,上的大学都是好大学。那时候没有大学排行榜,现在有了大学排行榜,人们就冲着排行榜去了,觉得排在排行榜前面的就是好大学。但是,你看今天国际上某些非常有成就的人,例如,ChatGPT的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他在斯坦福没有毕业就选择辍学,难道斯坦福不是好大学?似乎不能这么说,所以说好大学与每个人的背景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与这个人上了大学之后他所追求的东西有关。如果你只是为了找工作,那么哪所大学出来好就业,它就是好大学。然而,有的同学觉得上大学不完全是为了就业,而是要让自己重新认识世界,形成新的价值观,寻找人生值得为之全身心付出的方向和事业,能够在某所大学里达成这一目标,它就是好大学。所以,好大学在不同人眼里有不同的答案。

我们从小就知西方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也讲“知识改变命运”“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不管东西方的文化术语或者学术概念怎么表达,上大学一定是有益的,接受高等教育是必要的。当然,我们过去上大学,往往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考虑的,仅仅是把教育看成改变个人命运的工具,那是精英时代少数人的权利。现在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大家都会有机会上大学了,教育就要向着改变国家的命运、改变社会的命运,以至于改变人类的命运转变。这些都是新时代我对大学的一些基本认识。所以,不同年代的人,不同追求的人,对于这个话题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记者:我们常说“以学生为本”,当这些年轻人进入大学学习,您觉得大学应该营造怎样的“人人成才”的环境?

邬大光:“以学生为本”,在日常使用过程中,这句话既有“泛化”,也有“窄化”的情况。就“泛化”而言,“以学生为本”的实质是讲以学生学习的过程为本,以学生学习从这个层面来说,人们把“以学生为本”这句话给泛化了。假如说要求学生早上起来跑步、晨读,必须几点熄灯,需要遵循哪些纪律等等,这些方面我说就不能“以学生为本”,因为教育是培养学生成长的过程,对学生进行制度的规训,是必须的。

今天讲的“以学生为本”是什么?主要是指以学生学习过程为本,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例如,学生对专业的选择。现在年轻人上大学对专业的选择很少做到了“以学生为本”。你当年考大学的时候,学什么专业是你自己选的,还是爸爸妈妈选的,还是亲朋好友选的,还是高中老师选的,都是说不准的。就我为例,虽然是学高等教育出身,但我的小孩在选专业时也不是一帆风顺,也要经历一番博弈的过程。因此像这些学生入学后,发现专业不适合他,需要转专业,我认为这是应该给学生空间的。

再比如,现在学校规定,必须修够多少学分,哪些必修,哪些选修。但是学生想,那我修那么多专业课,我多修点选修课,不可以吗?我要跨学院、跨专业去选课,不可以吗?在线教育这么发达,我到各种平台上去选课,或者我到国外的一些大学,哈佛、斯坦福、伯克利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公共平台去选课,学校就不能认吗?等等。真正应该“以学生为本”的领域却被“窄化”了。

所以,不能什么事都要以学生为本,核心在于以学生的“学习过程”为本。

记者:现实中我们都会感受到年轻人方向目标不明,学习动力差,就业时没有干劲,就业后还有“不结婚、不生子、不买房、不消费”的“四不”青年现象,这些问题有没有哪些方面是在大学这个环节可以改变的?

邬大光:我碰到过好多种现象。尽管我和现在大学生是有年龄代沟的,但我很关注这些事情,有时间的时候,也会专门做一些调研和访谈。

关于大学生对就业看法、职业选择的问题。实际上,大学生到大学来读书,是为就业做准备,还是为生活做准备,还是为自己的成长做准备,这在高等教育理念中都是存在争论的。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清楚,无论是就业也好,还是职业选择也罢,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上大学是稀缺的机会,你上了大学,毕业后你的需求社会都能够获得满足。但是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你自认为你优秀,自认为所学的专业很好……实际上,社会和市场对毕业生的容纳是有限的,可是恰恰好多学生对这个变化的理性认知,我认为是不够的。

对于社会的这种变化,要让学生有一个新的认识,包

括老师在内也要有新的认识。例如,就选专业而言,哪些专业是未来社会的热门专业、是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专业,我们是判断不准的。所以,在大学里,不要以一种专业的思维来培养学生。当你不以一种专业的思维来培养学生时,怎么让学生选课、转专业等,都要给他一个灵活的通道。

社会发展,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地区或城市,学生所学专业和他就业时职业选择的匹配度就越低,这在高等教育研究上是有数据支撑的。但是这些理论常识被束之高阁,没有被多数学生和家了解。今天社会上很多人对上大学、选专业、大学毕业之后的职业选择等问题,多是非理性的。所以,我现在一直在经常说,需要重新启蒙对大学的认识;对大学的管理者来讲,怎么办好大学,怎么办专业,要重新启蒙;做高等教育研究的人,也需要重新启蒙,帮助大众能够对高等教育有一个更加理性的认识,这样全社会才能形成一种新的认知、新的选择、新的判断。

记者:当大学培养的毕业生进入社会,用人单位普遍又会说上手慢,校内所学知识几乎都用不上。您在书中有一个观点:社会对大学的人才培养可以提出若干目标,但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理解,只要大学培养出合格的“人”,便自然是“才”了。那么大学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匹配、迎合社会的需要?

邬大光:这个也是分阶段的。早期的大学,专业没有分化得像今天这么细致,只有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四大学科领域;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很长一段时间连专业这个称谓都没有,只有必修课、选修课,靠课程来影响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按照经济建设中和行业和产业的布局进行专业设置。到了今天的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专业设置已经明显落后于行业、产业的发展和需要,社会和教育的互动模式与过去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了。

今年5月底,我参加某大学的本科评估,他们学校的校长就告诉我,他原来工作的学校以煤矿开采见长,现代化的煤矿开采,人都不需要下地下去了,都是完全的机械化、智能化运转。可是我们的教材还在讲,怎么防瓦斯,怎么防毒气,怎么防渗水,那还需要教吗?人都不到地下了,教了有什么用呢?这就是大学教育落后于社会发展的表现。

因此,我们要重新认识教育,重新认识上大学。今天的大学,我认为它已经不是简单以知识为主,也不是以专业为主的,它是你这个人思维能力的形成为主的,而且这种思维能力还不是一般的思维能。从教学术语来讲,是批判性思维;从心理学术语来讲,叫异思;从政策语言来讲,就叫创新人才。时代真的变了,在AI时代,一天24小时所产生的知识和信息,一个人要60-70万年才能读完。

记者:我们再回到大学发展本身的问题上来。您在书中提到了“好大学”的十个特征:一所好大学,一定是以培养人为第一位的大学;是能够改变学生命运的大学;是超越了排行榜的大学;是能够领跑的大学;是制度与文化有机结合的大学;是有定力的大学;是懂得经营的大学;是十分精致的大学;是能够把教育理念转化为扎实行动的大学;是有危机意识的大学。您觉得我们国家目前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大学?占多少?

邬大光:这个问题有点尖锐了,我不确定是否能够很直接地回答你。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大学在硬件设施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各个学校建立起了宽阔的校区,明亮的教室,先进的设备,优美的校园环境等等,这都是现代社会成为一所“好大学”的基本标准。从QS世界大学排名榜、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榜、U.S.News世界大学排名榜、ARWU世界大学排名榜等著名的大大学排名榜来看,世界200强大学的排名,中国大学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这些都客观地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进步。

就以上所谈到的“好大学”的十个特征而言,各个大学在不同的方面,都在进行不断地努力,有了可喜的变化。但是,“排行榜”问题一直是老大难问题。现在大学的各种排行榜,学科排行榜,高被引排行榜等各种排行榜非常多,似乎只要在某一个排行榜上占到一席之地,就能称之为“好大学”,导致“排行榜”日益异化成办学的指挥棒,排名标准怎么设立,学校就怎么建设,这使得很多具有优良传统的高校在办学的过程中,逐渐趋于同质化,如地方行业院校的发展,在以学术型和综合型为主的高校评价趋势的影响下,明明是“小而精”的典范,结果“特色”愈发消解,出现了很多问题。

我是反对“排行榜”这些东西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十年前我就在《中国教育报》发表过世界大学排行榜的由来,国外一些机构为了摆脱债务危机,给杂志创收,才开始做大学排行榜,这么着把报纸或者杂志给救活了。不同的排行榜侧重的指标,赋予的权重是不一样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大学在排行榜的位置是存在差异的,这都是“资本”因素在发挥着看不见的作用,甚至“文化偏见”等因素都是存在的。排行榜多吗地有科学性、合理性、公平性,是值得我们去商榷的。它只是提供了一个相对的参照,不要笃信它,更不要神化它。

今天的大学从量上来说,可以排出无数的指标,但越是根据指标排名,它遮蔽的好大学的东西越多。为什么呢?

例如,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当年的成果都没人看得懂,没人看得懂就没人引用,没人引用它发表都难,而且都是发在一些不著名的期刊上。所以,现在我们越是高被引,越是热门,然后是新的验证,这类研究的引用就最多,但真正的价值似乎并不显著。关于这一问题,我就谈这一点。

记者:您在书中写到,大学自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某种救世性格,充满理想和建构主义热情,这一点在今天看过时吗?

邬大光:不过时。这是大学最基本的文化性格,是与生俱来的基因,是镌刻在大学骨子里的烙印,无论时代发展得有多快,创造的大学模式有多新,大学都会在某方面保留这样一种思维特质和行为品质。这说明了在快速发展的时代浪潮和历史洪流中,大学相比其他组织,是非常“保守”的,甚至是“守旧”的。例如,对高等教育学影响深远的著作,当推纽曼的《大学的理想》。纽曼写的时候,他看不惯当时英国的新大学,在他的书里,他就讲,大学不应该“与时俱进”,进行职业教育,反对培养应用型人才,大学要加强通识教育,培养具有理性思维的绅士。就像我说的,今天大学的专业程度越来越强,通识教育则越来越重要。纽曼的高等教育思想,特别是他对大学“保守”的期待,在今天依旧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记者:那您认为今天的通识教育做得怎么样?

邬大光:我认为今天的通识教育做得不好。像我这一代人,包括你这一代人,几乎都是在专业教育下成长的,本身通识教育能力是很弱的。有些具备通识素养的老师,他们都是自学的,或者有家传因素在里面。我就发现了,现在中国的单科性大学,开通识课最难,即使在双一流的综合型大学,真正能够开好通识课的老师,都是非常少的。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合理性,也有现实的必然性。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基于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我们放弃了自民国以来欧美通才式的教育模式,采用了苏联式的专业化培养模式,强大的历史惯性,自然深刻影响了今天的人才培养思维。就现实而言,当前大学里第一代大学生偏多,背负的责任和期待比较重,为了改变个人命运,往往他们就业思维和应聘情结很重,上大学就是为了掌握专门的知识,能够胜任职业岗位的挑战,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对没有明确专业目标指向的“通识课程”是不关心的,即使选修这样的课程,也是出于培养方案的外在约束,在课堂上,多数人也是在做和专业有关的事情。

但是,今天通识教育对学生发展、学科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科学技术到了交叉学科、跨学科阶段,带来了新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都是接受专业教育成长的,知识教育,我们的交叉学科、跨学科的能力也是弱的。交叉学科和跨学科,往往它都是以一种新的形式来进行,需要学生具备“跨界”的素质,不能够只在某个学科领域、某个知识领域过于执着,陷得过深,只会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折腾。我们讲的交叉学科、跨学科等通识能力的培养,在日常教育过程中,无论在什么课程或学科的讲授当中,教师自身都要具有通识的思维,并向学生渗透。

记者:那现在有没有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能把您说的这些短板,不求特别快速,但是能够把它融合,以及至少朝着解决的方向去努力呢?

邬大光:一方面,管理要发生变化,例如,要给学生更多的空间,专业课、学时、学分不要那么多,让学生自己有机会去选择性地学习一些东西。现在不管上什么课,到真正的课堂去看一遍,有多少学生在认真听?睡觉的、低头玩手机的比率都太高了,要给学生一个自主的学习空间,从管理上要有一种新的机制。另一

方面,核心还是在于老师的引导,我认为,现在大量的老师,都是所谓的专业性人才,而不是创新型人才,老师都没有创新的意识,怎么培养创新的学生呢?即使出了一个创新的学生,也与老师无关。

记者:有些中西部高校也不乏自己的特色的一流学科,但是有专家指出,西部高校的“双一流”建设普遍存在“做大”的思想。因为觉得这些“小众”学科并不足以证明自身的整体实力,更希望在“大众”学科上追赶东部地区高校。您怎么看大学发展中的主流与特色的关系?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邬大光:每个大学的学科都有它的学科历史,我们今天讲主流学科也好,特色学科也好,它在历史当中所形成的作用和当前国家的要求是存在差异的。

例如,兰大的特色学科有大气科学、生态学、草学、核学等。实际上兰大的特色学科就是保护中国西部的生态安全,这种生态安全既包括最初的草业、畜牧业安全,也包括和治沙有关的气候安全,还包括当前利用现代技术保障核能的安全。事实上,现在好多大学的主流学科或特色学科都是在学科视野内的所谓的主流和特色,如果说中国这些大学都真正做好了它自己的主流或特色学科,哪还有那么多卡脖子问题?这些主流学科、特色学

科要做的,恰恰是解决中国各个领域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现今学科建设不能回避的问题,从带引号的“学科”来讲,它建设得很好,可是这些“学科”实际上要知道今天社会需求的是什么,发了那么多论文,如果社会不需求,和解决卡脖子问题无关,建设再多也没用。

下一轮的学科评估,可能就会看学科的贡献度,你说你厉害,那你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哪个领域的卡脖子难题?最近,我参与教育部一个政策的起草,文件组就把“贡献度”作为学科建设、学科评估的一项重要原则,不再只看一个学科内有多少长江、多少帽子,多少课题。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是龙头,龙头不是发表论文数量的龙头,也不是被引的龙头,更不是排行榜的龙头,而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龙头,是引领国家科技创新的龙头,是助力产业行业升级的龙头。

记者:从书中您的观点来看,在大学中教学应该优先于科研,但现实中不完全是这样。我们需要改变吗?怎么改?

邬大光:人才培养是大学第一位的职能,相比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现在不仅仅只有大学这个组织能做,企业、公司都能做,甚至某些大企业、大公司做得比某些大学还要好,大学正面面临逐渐丧失“引领”社会发展的危机。所以,大学必须回归到“育人本位”上来,这是其他组织不能替代的。从这个层面上说,教学应该优先于科研。现在大学存在的很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两者颠倒导致的。

实际上,教学科研不分家。现在出现两种情况,第一,我认为科研做得好的老师,他教学一定会做得好的,只是他不愿意做教学罢了;第二,教学真正做得好的,科研能力一定也不会差,这两个本来是不分的。所以,我就经常说,教学可以反哺科研,科研也可以反哺教学,从原理上来说是这样。

邬大光:那是个文化问题。原因是我们的评价体系出了问题。所谓的“帽子、项目、绩效”等都跟科研挂钩,就导致能做好科研反哺教学的,都不愿意花时间去做了,因为教学还不如科研来得实惠。所以,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是管理导致的。

记者:现在常说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这个高质量内涵式的意思应该是什么?

邬大光:过去我谈高等教育要走向外延式发展,因为高等教育的体量小,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体量等基本国情不匹配,借鉴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理论,我国高等教育需要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但是,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张,我国相比其他国家或地区,用了最短的时间,实现了普及化。高等教育“数量”增长问题,自然被“质量”议题所取代,放在第一位的就是人才的高质量。大国博弈,现在越博弈就越聚焦到人才上来了。为什么党的二十大报告讲人才自主培养呢?就是说自主培养要高质量的培养,而不是一般的培养。

记者:从担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相关职务,参与全国高校学科评估工作,您体会到国家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一种什么样的期盼和要求?

邬大光: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政策层面,就是从质量到高质量,我国高等教育“大而不强”是事实,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质量”上下功夫。“质量”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不同阶段,对“质量”维度和程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目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能够切实回应这一目标,满足国家重大战略的需要,同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高质量”水平的体现。

记者:如果我们们的眼光再放得长一点,十年二十年之

后,根据我们的经济和人口的发展趋势,如果还想保持目前“好大学”“一流大学”的地位和态势,没有什么是需要未雨绸缪去考虑、去做的?
邬大光:从未雨绸缪的角度说,还得从大学职能出发。第一就是人才培养,现在国家最希望大学做的,就是培养高质量人才。但是,今天的人才培养,继AI时代、技术时代到来之后,传播知识的方式,形成知识的方式,学习知识的方式,对我们的专业、学科、课程、课堂等建设都提出了挑战。而我们这一代人正处在这一挑战的过程当中,尽管我是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这一过程最终会走到什么层面,现在我是给不出答案的。我的基本判断是,它和我上大学读书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随时保持一种对社会变化的趋势、科技变化的趋势,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把握。在变化当中努力去寻找属于规律性的东西,在变化当中形成符合新时代的一些做法、理念或思想。
记者:您走访了世界40多个国家的172所高校,包括所有的世界一流大学,您觉得那些古老的大学的理想、精神、隐性的文化潜规则在今天,对我们国家的“好大学”建设有什么现实的借鉴意义呢?
邬大光:大学都是有文化的。一所好的大学应该不是靠制度来治理的,而是靠文化,或者我们用一个术语来讲,叫“学者共同体”,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和规范。也就是说,当我们试图用各种制度管理大学,制度越来越刚性,越来越精细的时候,就是大学文化最缺失的时候。制度能约束行为,但约束不了人心。大学也是一样,当我们试图把无所不在的各种规定通过制度的形式明确下来,让一个老师按照这个标准去执行的时候,那我只能说,这个大学没有文化,这句话有点尖锐。当这个现象不改变的时候,即使我们的大学在排行榜上名次有多靠前,成果有多多多,我认为它都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它都不是一流大学真正的核心。一所好的大学,只有从制度当中跳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好大学。
记者:好大学文化的形成,先决条件是什么?
邬大光:是“共识”。好大学的文化,它是靠包括学生、教师、管理者等在内的每一个个体集体来营造,学术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甚至是命运共同体共同体的形成,不都是这样吗?在中国文化当中,现在我对“一”字非常感兴趣,知行合一、一以贯之、表里如一。中国那么多文字,只有“一”字最重要,最后什么都归为一,在大学里,这个“一”就是文化,我是这么看的。这些道理所有人都懂,说起来都明白,但就是不做,这也是个文化问题。
记者:从整个人生的教育、成长规律来看,您有没有什么话想对那些即将要上大学的年轻人说的?
邬大光:人生是一场长跑,不能为一时的得意而沾沾自喜,也不能为一时的失意而郁郁寡欢。能够上一所大家眼中的“好大学”,固然是好事,这只是在某一个阶段,让你相比其他人,有了一条较为平坦的跑道。但是跑得怎么样,还是取决于你自己。跑过这个阶段,你又将面临新的“赛道”。所以,读大学是好事。只要一个人自己爱读书,不管是过去的985、211,现在的双一流,还是地方性大学,这些大学在他初中的跑道没那么平坦,但是出彩的人,依旧能够在泥泞小道上,跑出林荫大道的风采。我是这么看的,道理都没那么复杂。谢谢您今天的采访。

何馨:但行教途 无问西东



本报记者团 顾雨彤 马瑜

“我在兰大教书已经20年了。”眼前的人面带笑意,双手握着杯子,回想着与兰大的初相识。

何馨,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2021级英语丙班、丁班班主任,讲授大学英语、公共英语演讲、国际组织文献选读等课程,曾获兰州大学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指导教师等多个教学、学生学科竞赛奖项……

“我的母亲也是一名老师。”何馨说,从小受到家庭氛围的熏陶,他选择了师范专业。2003年毕业后,顺利成为兰州大学的英语教师。

从普通教师,到成为受学生喜欢的老师,再到成为被学生信赖的朋友,何馨用了20年。这20年,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躬耕教坛”的教学准则,用国际视野强化着“强国有我”的责任意识。

正如何馨在学习通签名上写的:“但行教途,无问西东”。

“我是一个可能会‘加戏’的老师”

“我很会给自己的课堂‘加戏’。”何馨说出这句话时,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的课堂,总是生动有趣。

2008年,汶川地震的噩耗让全国人民心痛。国家哀悼日期间,恰好有一天是何馨的课,他便将课程内容进行了修改。何馨搜集了国内外有关此次地震的部分英文报道内容,让学生准备一些小蜡烛,在课堂播放了伤感的英文歌曲,借此表达对受灾同胞和遇难者的同情与哀悼。

从2006年开始,17个年头里,何馨经常会在春季学期的大学英语课上设计一节特殊的“将军院”课程。在何馨的课堂上,他经常会播放一些英文歌曲,借此表达对受灾同胞和遇难者的同情与哀悼。

除了在教学形式上给自己“加戏”之外,何馨更多的是在自己的教学任务上“加戏”。

在何馨讲授的公共英语演讲课上,每位学生每学期要进行三次正式演讲。这三次演讲的主题各不相同,每一次演讲的分数由“提纲分数”“演讲稿分数”“演讲表现分数”三部分构成。

何馨一学期带三个班,一个班平均35位学生,一次演讲打三个分数,三次演讲就是945个分数——这远比给学生打出一个演讲总分复杂得多。

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如此“不厌其

烦”地完成一份有些繁琐的工作时,何馨说这样才能保证客观、全面,以评促学。“有些同学演讲的时候会紧张,但他的稿子写得很好;而有些同学很‘社牛’,实则说了一通后发现稿子还要再打磨。”何馨回忆道。

三个不同的分数衡量着学生在不同阶段的努力程度,即使打三个分数会耗费何馨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他也依然坚持如此打分。这945个分数不仅留在了同学们的成绩单上,也留在了每一位学生的心里。

“何老师会针对你个人的表现,非常具体地给出改进建议,甚至细节到一个词的用法。”管理学院2021级本科生罗秋悦在谈到何馨时,敬佩流露在字里行间。“他非常在意我们每一个小技巧的进步,即使一段时间后我们会遗忘这些知识,他还是会同我们付出大量的精力帮助我们成长。”

何馨虽打趣自己爱“加戏”,实则每一次“加戏”的初衷都是给学生更好的课程体验——既要给英语学习赋予有趣的形式,也要给学生带来更为精细的帮助。

“我期待能和学生目光相对,彼此点亮”

记住一个人的名字是交友的第一步。何馨说起自己的学生时,会骄傲

地说:“我会记住每一个同学的名字。”

这不仅仅是因为何馨在线上线下都和同学们有充分的交流,更是因为他想和同学们成为朋友。

2019年,何馨受邀参加了一个特殊的聚会,是他任教后带的第一届学生举办的毕业十周年重返母校聚会。何馨赶到现场才发现,受邀的老师大多是专业课教师,而自己是唯一的一位公共课教师。

“公共课教师给学生上课的时间通常只有一到两年,所以很容易被忘记。但他们能想到我,还邀请我参加聚会,我挺欣慰的。”何馨说。

这种挂念是老师和学生之间最淳朴的情感联结,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后来何馨又受邀参加口腔医学院毕业生的十周年聚会。为了见上一面,他和校友们努力克服十几个小时的时差。“当时我在美国,他们说即使我在网上也和我聊聊。”何馨说。十几个小时是中国和美国的时差,但不会成为彼此牵挂的朋友之间的时差。

当他曾经的学生得知何馨在北京借读时,两人在北京续写了一场毕业十年后的见面。“那是我2010级的一个学生,叫俞冬秀。”何馨谈起过学生的名字时,从无不马虎。俞冬秀在给何馨的微信中写着:“我希望我儿子以后也能遇到很多用心教学的老师,比如外国语学院的何老师您、哲学学院的汪老师、新闻学院的穆老师……”

“对学生来讲,他就在乎你对他们重不重视。”何馨说。分别十年,正是因为他与学生相互尊重,这场师生情才能一直延续至今。

“在大学里和学生待在一起让我觉得舒服、有力量。”回校之后的他欣然接受了英语系主任史菊涛老师的邀请,再次担任了外国语学院2021级英语丙班和丁班的班主任。

除了在公共课上和学生们打成一片,他也积极和两个班的学生交朋友。从参加班级聚会到参加年级运动会、学校运动会,只要班级有需要,他都会第一时间参与其中。

“何老师关心班级生活,我们大大小小的活动他能来的都会来参加。我觉得他一点儿都没有架子,特别亲切。”外国语学院2021级英语丁班王思齐说。不管是对自己公共课上的学生,还是对自己带班的学生,何馨都用一百的热情与他们的交流,时刻准备和同学们进行一场“友谊长跑”。

“课堂,就是我的舞台”

对学生来说,每节课的内容都是新鲜的,但对老师来说,可能很多内容都是重复的——在课上讲演理论,陪学生练习演讲技巧,教同学们英语知识。

但是这样看似重复的课程内容对何馨来说却不是一种“复制粘贴”。“我每次

上课都会加入一些新的东西,把上课思路理顺。我不希望我的课堂是重复多次的,没有精气神的课堂。”何馨说。

2022年,何馨所教授班级分组共同制作完成了一本“My Favorite English Speeches”的电子杂志。在这本杂志里,能看到课堂上每一个小组成员收集到的他们最喜欢的演讲、演讲的中文翻译和学生的分析收获等内容,甚至部分还有编后语。

“本杂志不仅仅是一次小组作业的成果,更是对本学课程总结和反思,特此感谢本组成员对本次编辑工作的辛勤付出。”这是其中一本杂志某一页上的编后语,一幅莫奈的画印在底部。宁静的画面上端写着“2022年秋兰州大学 Mr. He 公共英语演讲课学生作品”。漂亮的排版都倾注着小组成员的心血。这是何馨第一次尝试用“电子杂志”这样的形式总结课程,也给同学们的



公共英语演讲课上圆满的句号。

在何馨的课堂上,你还能看到春天的迎春花、夏天的烈日、秋天的落叶和冬天的白雪;听到系列国际组织的英语演讲,了解到最新的时政动态。这些每天在身边出现的“新东西”都会为他的课堂添彩,而最新的学习素材总能在循规蹈矩的传统英语课堂上给学生带来全新的国际视野。这种国际视野也是何馨从一次次次的进修和探索中摸索来的。

十二月的北京天气寒冷,但他疫情前每一年的雷打不动地前往北京参加英语演讲教学研修,到“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的决赛现场“打卡”,与同行的老师交流,从中不断学习。

八年前,他作为国家留基委公派英国金斯顿大学访问学者前往英国,学习国外的英语教学理论和教学方式。访问学习结束之后,他将学到的东西运用到课堂中,帮助学生们更深层次地了解

我们兰大人

“critical thinking”。

而就在去年,外国语学院又新开了一门叫“国际组织文献选读”的课程,老师们组成课程组,新编讲义给学生上课,何馨便是其中一员。

开设新课比重复旧课,对老师们来说会有很多挑战,但何馨说:“同学们需要有一种新的国际视野,你需要走出去,讲中国故事。无论是公共演讲课,还是文献选读课,它们可能会帮助你打开另一扇窗口。”

把语言当成利器,为每一颗“中国心”装点国际视野,这是何馨十年“更新”自己的初衷。“我们都是普通人,但只要大家肯往外说,说的人逐渐多起来,就会让全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何馨说。

“何老师那种‘苟日新,日日新’的精神让我也更加认真地对待大学课堂,鼓励我持续努力。”罗秋悦说。“我做的都是一些普通的贡献。”“我只是一个平凡的老师。”……何馨总会反复提到“普通”和“平凡”这两个词。

在他看来,做一名兢兢业业的老师,帮助学生成长是自己最本职的工作。在这样看似平凡的教学过程中,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躬耕教坛,强国有我”,何馨用他的言行力为今年的教师节主题做出了最真实的注脚。

一周后,何馨将再次前往英国进修,“继续给自己充充电,回来后接着改进课程,我还要给学生们补充更新的内容。”何馨说。

原创·首发·独家

我们兰大人

本报记者团 黎红霞 张毅

“这都是我们近几年获得的荣誉”,刚走进兰州大学榆中校区陇山堂 B210 教室,马俊难掩激动地打开教室后排的柜子,里面是一排排摆放得整整齐齐的证书。“这是我们去年获得的两项金牌,这是在区域赛获得的,实现了兰大在这个赛事获奖零的突破……”马俊望着柜子里的证书,如数家珍。

一线从教29年,马俊已经在兰州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扎了根。作为专业课教师,



他力求上好每一堂课,带好每一个学生,不断探索学界与业界的前沿,作为竞赛指导教师,他勇于尝试,带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在尚未有兰大身影的赛事中蹒跚上路,最终登顶金牌。

“在兰大,就可以实现我的人生目标”

1994年,刚刚毕业的马俊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选择留校工作,在兰大的无数日夜轮转中,他从懵懂走向成熟。“我发现兰大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所以就动了‘窝’。在29年的一线教学工作中,马俊在每一堂课的实践中完善其知识架构与体系,磨练工作方法。

马俊的本科专业是力学,但后来惊叹于计算机的神奇,便从打字员开始自学,硕士才开始接受正规的计算机教育。“我当时在大四的时候就胆子大,敢去给老师代课上《计算机辅助教学》的课,站在台上脑子也是一片空白”,马俊笑着说,而如今的马俊在谈起课堂与专业知识时从容自如,早就没有了曾经的青涩。

从兰大的学生到兰大的教师,马俊一路走来感慨颇多。他认为对于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及时消化课堂内容,学到知识并加以应用。而作为教师要具备广阔的知识面,需要耐心和探索精神,紧跟专业发展前沿,才能解决学生在专业学习方面的困惑和难题。

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更新,更需要教师与时俱进,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作为教授计算机技术的老师,马俊一直关注本专业的最新变化,在校内开拓了Java语言的课程教育,并积极参与教育部和高校组织的各种会议论坛,提升自己的专业技术和教学水平。而兰大更是给予了他很多支持,信息学院也鼓励并积极资助教师去校外参会和学习。“今年我们在昆明听清华大学的老师讲数据结构的教学案例,非常不错,听完之后发现如果把把这些理念用到我们的学生身上,我们的同学就会有大幅度的提升。”他利用了浙江大学的编程教学辅助平台——拼题 A(PTA)平台上优质的教学案例和实践资料,实现辅助教学,并于2023年8月5日在《程序设计类课程教师培训会暨教育部-百聘教育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研讨会》做了“借力PTA实现新工科教学改革和提升大学生综合程序设计实践能力”的报告,获得广泛好评。在此基础上马俊开发了兰大自己的 OJ 平台,于今年秋季学期尝试推广使用。

马俊: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做教学的探索者

几十年的教学工作,让马俊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他将在课堂教学中感悟和积累的素材整理出版,把平时灵光一现的教学“好点子”编辑成册,目前已经出版6本教材,其中《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第3版》目前被几十所高校选用。能够出版教材,分享教学经验,马俊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想把这种教学经验和素材分享给更多人,同时也可以方便我们用适合自己的教材上课”。

马俊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探索建立更加便利的教学平台,近年来主持参与3项教研项目,并于2021年获得了甘肃省教育成果一等奖。其中,《兰州大学编程类课程及公共课在线测评系统的研究和设计》项目中研发的测评系统,已经连续几年在兰大本科生思政课程和研究生《形势与政策》课程中使用。

为学生答疑解惑,亦师亦友相伴成长

随着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普及,社会对于高级算法人才和扎实的工程实践人才的需求缺口日益增大,这就需要学生有针对性地提高专业能力。

“对我们信息院的同学来讲,计算思维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更为重要”,因此,马俊在课堂中积极组织同学们讨论程序设计和面向对象理论中的基本概念,通过实操演练的方式让学生快速掌握编程知识并能够上手操作。

目前在清华大学读博的陈

信息学院2020级本科生李文凯选修了马俊的Java面向对象编程课程,他表示:“老师课堂上会通过实例来讲解各个知识点,还会用生活中或哲学上的思想来帮助我们理解面向对象这个概念,让我有更加深刻的体会”。正是有了课堂知识与实践的积累,信息院的学生才能在一个又一个的比赛中不断突破,让兰大之名出现在更多的编程大赛领奖台上。

从兰大本科毕业后在电子科技大学读研的胡斌斌同学就是其中一位,他说:“马老师是一个很和蔼、有责任感的老师,也是我人生路上很重要的一位老师,他让我参加了程序设计竞赛,接触到各位大佬,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激发了我对计算机理论知识的兴趣,从而选择在研究生阶段转入计算机专业,我很感谢他的指导”。

课堂上,马俊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课堂外,他更像是学生的朋友,为学生答疑解惑,认真听取学生的困难,积极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难题。马俊认为每一个学生都是与生俱来应该自由发展的个体,学生处在快速成长的青年时期,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在逐渐地成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困惑。

目前在清华大学读博的陈中杰同学从马俊对生活乐观的态度和对人生的思考中受益,他表示:“马老师是我职业的引路人,老师的课程让我对计算机这门学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促使了后来我选择从事计算机相关的科研工作。”

厚积薄发,带队参赛历史性突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大学生团体程序设计大赛一天梯赛、ACM-ICPC 国际程序设计大赛等赛事并没有兰大学子的身影,“一开始我们连30个人的队伍都凑不齐。”谈到首次参加天梯赛的组队过程,马俊的话语中多了一份心酸。但是在马俊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下,兰大在该赛事取得了巨大进步,“第一年参加天梯赛,我们的得分比较低,但是到2022年,我们已经能拿到国家银牌,获得了很大的提升”。

2016年,信息院2015级学生陈冠斌找到马俊,想要参加 ACM-ICPC 大赛,但那时候兰大还没有学生参加过该比赛,亦没有老师指导。马俊鼓励陈冠斌组建团队,也欣然接受了担任指导老师的邀请。第一年,第二年比赛结果未能如愿,但马俊和陈冠斌越挫越勇,终于在2018年11月24日,他们组建的团队“咕咕队”在亚洲区域赛拿到了一枚

银牌,这也是兰大在该赛事获得的第一枚银牌。“这次获奖打开了我们拿奖的历史,以前我们可是团队参差不齐,这个奖拿着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整整折腾了三年。”马俊感叹道。

过去带学生参赛经历让马俊意识到,靠一个或几个学生单打独斗很难成功,于是他决定成立兰州大学算法和程序设计集训队,“当时很多同学非常热心,我们去宣传,召集大家一起培训讨论,写集训队的规章制度等等。”作为集训队的指导老师,马俊希望自己发挥的是辅助作用,比如给学生做课程上的安排,确定集训队时间,如何参加比赛等,具体的操作和落实则是鼓励学生负责人完成。

兰州大学算法和程序设计集训队自成立以来,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022年,集训队获奖数量迎来了历史性突破,不但拿到了两块 ACM-ICPC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的区域赛金牌,还拿到了两块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的区域赛金牌、好几块铜牌和银牌,“这一年的参赛队伍大大增加,最多时有5支队伍参赛,说明我们的算法和程序集训队确实发展壮大了很多。”马俊欣慰地说着,难掩喜悦之情。

目前集训队负责承办学校每年一届的校赛,以及承办暑期学校的助教指导等校内工作。未来,马俊希望集训队能走出兰大,完成更多工作。“希望将来我们集训队不仅能够提升兰大的学生,还能影响全省的算法和程序设计水平。”马俊对此充满了期待。

谈及未来的个人规划,马俊笑着说,在未来,他想上好每一节课,让学生有获得感,争取带给学生比较新的前沿知识和前沿技术,同时继续组织和带领学生参加各种程序设计类比赛,争取获得比较好的成绩,提升同学们的算法和程序设计水平,“为国家培养具有高水平高德行的人才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原创·首发·独家

